

普世价值观的新构想 ——变“道德乌托邦”的臆语为科学的全球伦理

徐世强,陈建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610015 成都市,四川省,中国)

提要:对于目前尚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思潮,我国学界的观点和态度可以归结为“阴谋论”和“乌托邦论”两大类:前者否认普世价值存在之可能性,并认为西方的全球伦理构想别有用心,应予抵制和批判;后者相信某些伦理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普适性,但对于全球伦理构想之实现又有审美的悲观主义、幼稚的乐观主义与务实的理想主义之别。本文评述了各自观点,揭示了西方全球伦理乌托邦性质的根由,提出构建和完善一种科学的全球伦理以扬弃和超越对方的主张,并分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意义。

关键词:普世价值观、道德乌托邦、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全球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者:徐世强,男,1975年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专业基督教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电话:15102899235,电邮:wsxusq@aliyun.cn,邮编:610015;陈建明,男,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电话:13084406116,电邮:chenjmw1@qq.com,邮编:610015,成都市,四川省,中国。

1993年召开的芝加哥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当前盘点我国学界关于全球伦理问题的研究并展望未来仍很有必要。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并且能够将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从人类的“道德乌托邦”变为科学的全球伦理。这种需要和可能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和赋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果实和精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这些,加上乐于吸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态度,可以构建和完善一种科学的全球伦理,以与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展开竞争。这既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参与意识形态领域全球竞争的现实需要,也是其追求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之途,将是中华民族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1993年芝加哥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以来,我国学界关于全球伦理问题的研究在此起彼伏的争论声中逐步走向深入。据赵敦华先生的观察,在1997年以前,我国学界对于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构想“赞誉者居多。有人虽有微辞,但也未触及根本。”他本人对其思想前提和学理基础深表失

望。^[1] 为便于论述,姑且把与此类似的判断或态度称为“反”方。与之相对的“正”方,可以万俊人先生为例。万先生稍后便从“道德理解”、“理论解释”、“方法论思考”等角度对“使普世伦理课题得以突显的背景和原因”、普世伦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普世伦理归诸人类的“道德乌托邦”之列,^[2]是较早以“乌托邦”一词评介普世伦理的学者之一。2004年,有关论文将我国学界对普世伦理的研究归结于 why(其前提和针对的问题)、what(其内容和特征)、when-where(其实现的可能和条件)、how(其构建途径和方法)等方面,可见学界研究之所及彼时已较为全面。^[3] 虽说争论从未中断,但主导局面的似乎是认肯其价值和可能性、探索其构建路径的“正”方。然而到了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非凡的2008年,双方形成了“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局面。^[4] 随后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逆转,由于探讨的内容“已由纯粹的学术视野转向了在探讨学术问题的同时,深刻揭露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动机,”“反”方逐渐主导了研究局面,直到今日。^[5]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学术争鸣还将持续,盖棺定论尚待来日。

截止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全球伦理的基本态度,可以粗略归类为二:其一是阴谋论。有的学者以阶级分析方法和价值相对论为依据,不承认有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认为西方的理论家炮制并四处兜售所谓的普世伦理,不过是项庄舞剑,必须加以揭露、批判、和抵制,故可称之为“阴谋论”。前文所述从2008年起逐渐占据上风的“反”方论者,多倾向于这类观点。其二是乌托邦论。有的学者认为,一些具有普世性、普适性的伦理价值是存在的,全球伦理构想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乌托邦”。为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将所有以“乌托邦”一词评介全球伦理的观点和态度统称为“乌托邦论”。需要说明的是,从语源学上讲,“乌托邦”(utopia)一词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具有否定性的意指;一是指一个完美无缺的所在,具有肯定性的意指。^[6] 因此,“乌托邦论”由于论者立场、观点之不同,有时意指全球伦理的非存在性或非现实性,在否定意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有时则侧重于其完美性或价值性,是肯定的用意。从逻辑上讲,如果论者既主张其非存在性,又完全否定其价值性,那就只能得出与阴谋论相同的结论来。鉴于此,本文拟分析评述的“乌托邦论”仅指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认肯全球伦理构想的价值或可实现性的观点或态度。如此,则可将持乌托邦论者粗分为三类:审美的悲观主义者(认肯其价值但悲观于其未来)、幼稚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于其未来但放弃构建之主导权)、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乐观于其未来并力争其构建之主导权)。

[1] 赵敦华 Zhao Dunhua,“也谈“全球伦理”,兼论宗教比较的方法论——从孔汉思的〈全球责任〉谈起”Ye tan “quanqiu lunli”,jianlun zongjiao bijiao de fangfalun;cong Kong Han Si de Quanqiu Zeren tan qi【On “Universal Ethics”,also on Religious Comparison Methodology:Starting from Hans Kung’s Global Responsibility】，《哲学研究》Zhexue Yanjiu【Philosophical Researches】No.12,1997.

[2] 万俊人 Wan Junren,“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Pushi lunli jiqi fangfalun wenti【Universal Ethics and Its Methodological Matters】，《哲学研究》Zhexue Yanjiu【Philosophical Researches】No.10,1998.《哲学研究》杂志刊载此文时配发编者按认为,赵敦华先生“对全球伦理问题似乎持否定态度”,万俊人先生“对普遍伦理问题似乎持肯定态度。”他指出,普世伦理曾经是人类“道德乌托邦”的理论表达之一。希腊化罗马时期斯多亚派所提出的“世界主义伦理”、基督教伦理的“千年理想世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设想的“道德乌托邦”,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大同”理想……等等,都包含着一种普世伦理的热望。

[3] 赵娟娟 Zhao Juanjuan,“我国近年来全球伦理问题研究综述”Woguo jinnianlai quanqiu lunli wenti yanjiu zongshu【Summary on Global Ethic Study】，《北京行政学院学报》Beijing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No.6,2004.

[4] 赵学琳 Zhao Xuelin,“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普世价值争论的基本问题”Makesi zhuyi shiyu zhong pushi jiazhi zhenglun de jiben wenti【The Basic Problems of the Dispute about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马克思主义研究》Makesi Zhuyi Yanjiu【Studies on Marxism】No.1,2011.

[5] 刘庆丰 Liu Qingfeng,“对近年来国内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研究的述评”Dui jinnianlai guonei guanyu “pushi jiazhi” wenti yanjiu de shuping【A Review on Domestic Study of the “Universal Value” in Recent Years】，《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武大哲学学院年刊)Makesi Zhuyi Zhexue Yanjiu (wuhan daxue zhexueyuan niankan)【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nual of philosophical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ty)】，2011.

[6] 张彭松等 Zhang Pengsong etc.，“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Wutuobang de lishi yanjin jiqi kunjing【The Historic Evolution and Dilemma of Utopia】，《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Baoji Wenli Xueyuan Xuebao(shehuikexue ban)【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 Edition)】No.1 Vol.26, Feb. 2006.

二

就其影响力而言,持阴谋论者在笔者看来首推侯惠勤先生。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普世伦理只是“由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构成的话语系统,实质上是反映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陷阱。”他将普世价值在“所指”和“能指”的层面进行区分,指出其“能指”虽然宽泛、但“所指”却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我国进行颠覆,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我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他甚至发现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夹杂着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轮流执政、要求三权分立、全面推进票决制等声音,因此旗帜鲜明地宣称,否认、抵制还是认同和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是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实质性问题,是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发生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交锋。^[7]从“中国知网”显示的侯先生有关文章的下载和引用频次可以看出,执阴谋论之牛耳者非他莫属。《人民论坛》杂志最近的“特别策划”栏目刊载《“普世价值”论包裹的“私货”》一文时配发了这样的摘要:“关注理由: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宣扬‘普世价值’思潮的人企图把党的十八大精神歪曲为‘普世价值’,力图在十八大的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塞进‘普世价值’的内容。核心观点:‘普世价值’的思潮鼓吹社会主义改革应该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融入西方文明。新动向:借助一些社会热点,为我所用,这是近期‘普世价值’思潮传播中的一个新特点。”^[8]作者(或编者)的这种观点和立场,实与侯先生轩冕相袭,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对于这类阴谋论,笔者认为,它看到了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公然挑衅或潜在威胁,是有根据的;但是另一方面,其论证方式和应对策略颇为值得商榷。首先,将阶级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相对性的一面绝对化,割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在的价值原则与资产阶级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确立起来的相应原则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有违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容易给人以马克思主义无视合理的基本伦理诉求的错觉,会在实践上导致共产党丧失群众基础和负责任的政党形象的危险。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诉求所蕴涵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社会和谐理念、共同富裕目标等,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共同遵循和维护的行为准则。^[9]其次,指出西方全球伦理之别有用心固然没错,但如果不尊重其他学者的发言权,只会一味批评和指责,甚至上纲上线、弄得人人自危,并不是建设性的态度,搞不好还会引起所谓“唱红打黑”式的折腾,自乱阵脚,甚至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可以肯定,以搞运动和站队式的“左”的方式抵挡西方的文化炮艇,充其量只是一种消极防御策略,绝非长久之计。

尽管近年来相对势弱一些,但整体比对20年来有关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难发现,各种乌托邦论应是学界最为常见的声音,现分别略作评介。一、审美的悲观主义者往往认为,全球伦理构想虽然美好,但不可能实现,“全球伦理只是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乌托邦。全球伦理的鼓吹和实践必然是悲剧性的。”“全球伦理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又是美好的和必需的。”“这

[7] 侯惠勤 Hou Huiqin,“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Women weishenme bixu pipan dizhi “pushi jiazhi guan”【Why Should We Must Criticize and Reject “Universal Value”】，《马克思主义研究》Makesi Zhuyi Yanjiu【Studies on Marxism】No.3,2009.

[8] 刘书林 Liu Shulin,““普世价值”论包裹的“私货”“Pushi jiazhi” lun baoguo de “sihuo”【“Contraband” in “Universal Ethics” Promotions】，《人民论坛》Renmin Luntan【People’s Tribune】No.3,2013.

[9] 郭明俊 Guo mingjun,“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观”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 tixi yu pushi jiazhi guan【Socialist Core Values System and Universal Value Ideas】，《求实》Qiu Shi【Truth Seeking】No.4,2008.

种伦理学的鼓吹者当属人类当代的圣徒、现代人类的普罗米修斯。”^[10]论者的理论依据很充分,如卢风教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利己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条条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11]事实依据就更不用说了,可以信手拈来。其基本理由是,西方国家所作所为之“实然”,非但不能达到、反而常常违背其所谓全球伦理所倡之“应然”。显然,这类观点相当流行,有时还与阴谋论遥相呼应。但是应当指出,审美的悲观主义论过于消极,不值得提倡,因为对西方国家所作所为的批评和责难除了能逞口舌之快,并无助于党和国家自身的建设。退一步讲,如果据此而在一些最基本的、广为世人所认同的、如和平、民主、自由、环境保护等道德原则和伦理责任面前一味消极无为,小到个人、社团,大到党和国家,都将丧失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依据,人类共同的生活基础也将不复存在。二、幼稚的乐观主义者往往认为,西方主导的这套全球伦理不但美好而可行,还有利于破解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难题,因此可以全盘接受。殊不知,全球伦理构想完全可能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工具,如不加鉴别地照单全收,容易引狼入室,轻则干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则葬送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历史成就,动摇党和国家的根基。虽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在某些方面不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但其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难以破解的难题,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决不应该以之为圭臬。这种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倾向有害无益,容易导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警惕。这种观点之所以常常遭到阴谋论者的猛烈抨击,并不难理解。三、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认为全球伦理既美好又可实现,但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接受西方的话语霸权,而是主张以中国元素为主导,通过强化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而实现全球伦理既定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科技实力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这种论调越来越受人追捧。一波接一波的国学热、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国家近年来开始实施的文化兴国战略等现象和事实背后,都不乏类似的观念和动机。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主基调是保守的,在实践中,在对内强调回头向祖宗要依据、借力量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民粹主义的回流和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难以形成真正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对外怀疑和拒斥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也不太可能自觉地深化、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持守,因此总的来说还是一种前现代性的努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终归看来,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应对西方全球伦理思潮的观点和策略似乎横竖难尽人意。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么?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既有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结晶和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和革命实践、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又可依托包容性极强的、见利思义的、群体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身塑造一种亲切友善、勇于担当的国际形象,可以说集东西方文明之大成于一身;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排名全球第二,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1/5,在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飞速融通的信息时代,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历史机遇,理应锐意进取、把握机会,变被动为主动,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那样,将人类的道德乌托邦改造为一种由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科学的全球伦理,与西方的全球伦理思潮针锋相对,在理论和观念上扬弃它,在竞争与合作中超越它。

[10] 崔建霞、孙美堂 Cui Jianxia, Sun meitang, “‘全球伦理’的两难” “‘Quanguo lunli’ de liangnan” [Dilemma of “ Universal Ethic”],《人文杂志》Renwen Zazhi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1, 2002.

[11] 参卢风 Lufeng, “普世伦理的三重障碍” Pushi Lunli de san cong zhangai [Universal Ethics’ Three Obstacles],《求索》Qiu Suo [Seeker] No. 6, 1999.

三

相对于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科学的全球伦理应是对其否定意义上的乌托邦性质的否定,是将乌托邦变为科学的努力。为此,必须深入揭示西方全球伦理乌托邦性质的根由。笔者认为,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的乌托邦性质是由与生俱来的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普世主义是基督教思想教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据陈建明先生的总结,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从救赎论的层面来讲,普世主义是指人人都能得到拯救,因为基督的救恩是为全人类设立的,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二是在教会论的层面,它“意指基督教具有普遍适应性,教会的建立将不受文化、种族和社会阶层差异的限制,而且各民族各地方教会共同组成普世合一的教会”。在前一个层面,基督教普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普救论”或“普救主义”,是全善的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12]这类无条件的爱的“宝训”之逻辑后延。但这种救赎观却一直为许多正统教会所不容,在那里,上帝对人的救赎是以人对耶稣的信为条件的,其矛盾性由此可见。在后一个层面,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也是自相矛盾的:它继承了犹太教的相关理念,但其继承却是通过与犹太教相分裂而实现的;在“大公教会”的意义上,普世主义徒有其名,因为教会在组织上和神学上的统一其实主要是政治权力的需要和长官意志的结果;公教与正教的普世主义表面上水火不容,互为“统战”的目标,但其实质与内核却是一样,即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和权力谱系;宗教改革以后,旧教长期力图“合一”新教与正教均无果而终,却部分地在新教发起的普世合一运动中“被合一”了;而新教各大派系合力发起的普世合一运动,到头来却变成了孔汉思等旧教思想家们大放光彩的舞台。^[13]撇开历史和现实中五花八门的“异端”不说,单就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合一前景就难言乐观,由此衍生、催生、派生出来的全球伦理目标又何可奢谈现实性和可实现性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14]基督教普世主义在不同层面上的矛盾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超越理念与现实利益的矛盾。作为道德范畴的基督教普世主义,由于其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基督教话语体系中的全球伦理之花纵然艳丽多姿,终究只是一朵无实花。进一步分析这朵无实花的“基因”可以发现,决定其乌托邦色彩的链条与犹太—基督教所宣扬的人性本恶的伦理预设及其引发出来的自利原则和丛林法则有关。无论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论和社会生活原则基础之上的,但却无不与全球伦理的构想相悖。对于这种人性论隐含的深刻矛盾,西方的理论家当然是了然于心的,但是他们相信,“本真的利己主义”必然走向“本真的利他主义”,甚至能够达到“为朋友舍命”的地步,因此这种人性论并不会妨碍全球伦理构想的实现。他们的逻辑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首先必须是本真的爱自己,它包含着向外的运动即走向爱他人。未能认识到这种本身的自爱乃是基础,这是共产主义之类理想主义体系的根本缺陷,它们企图建立一个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社会。”^[15]这就是说,经由自利而后利他,从爱自己可以走向爱他人,这是西方所谓“符合人性并促进人性的社会”的伦理逻辑基础。问题在于:既然

[12]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简体中文和合本)第5章第45节 Xinyue Quanshu Matai Fuyin (Jianti Zhongwen Heheben)【Matthew, The New Testament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from NIV) Mat. 5:45.】

[13] 陈建明 Chen Jianming, “基督教普世主义及其矛盾” Jidujiao pushi zhuyi jiqi maodun【Christian Ecumenism and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世界宗教研究》Shijie Zongjiao Yanjiu【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No. 2, 2004.

[14] 王淑芹 Wang Shuqin,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历史观对普世伦理的超越” Makes zhuyi de daode shehui lishiguan dui pushi lunli de chaoyue【Marxism Moral Social Historical Concept's Transcendence to Universal Ethics】,《道德与文明》Daode yu Wenmin【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No. 3, 2009.

[15] (德)孔汉思、库舍尔(GER) Hans Kung, Karl-Josef Kuschel,《全球伦理 世界宗教议会宣言》Quanqiu Lunli: Shijie Zongjiao Yihui Xuanyan [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何光沪 He Guanghu 译, (成都 Chengdu: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153.

如此,何必还要倡导构建全球伦理呢?全球伦理志在促进解决的那些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棘手问题,哪一个不是因唯利是图和唯我独尊引发出来的呢?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等待就是了。因为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会等来那些奉行“本真的利己主义”的“朋友”为你着想、甚至为你舍命的美妙时刻!你相信吗?

很显然,这种逻辑和陈述在“本真的”基督教话语体系中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众所周知,“为朋友舍命”的典型无出耶稣之右者,如果纯粹的利己主义必然走向纯粹的利他主义的话,耶稣取死于十字架的动机岂不还应当有一种利己主义的解释?果真如此的话,基督徒们学习耶稣、效法基督究竟是要为了操练利他的美德呢,还是学习自利的功课?想必没有人会否认,基督教的耶稣正是纯粹的利他主义价值理念的化身之一。共产党人虽然不信仰宗教,但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经典作家在历史和逻辑上都受到历史的耶稣或信仰的基督的伟大人格的熏陶和感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马克思本人为例。他出生于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犹太家族,在成为无神论者之前从组织和信仰上讲应是一名基督徒。在中学毕业时论宗教问题的考试作文中他写道:“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16]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7]他用毕生的心血和奉献注释了自己的人格理想。恩格斯在他墓前的讲话中评价说,马克思一生有很多敌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私敌。毫无疑问,“马克思青少年时期所深受感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不失为其思想历程的起跑点”,^[18]这是符合实际的。不妨又以恩格斯为例。他本来想成为一名诗人,因此读了大量充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文艺作品,其中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前者对宗教的质疑,引导他从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后者对贫苦人民的同情,使他在父亲的工厂里看到的不再是利润,而是工人们所处的悲惨状况,于是希望自己能够像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一样,把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19]

不容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逻辑是以利他主义为导向的。这种利他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本来就根植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之中,却在西方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为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蒺藜所窒息,无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阶级社会及其宗教和道德的批判,剔除了其宗教外壳和空想的、虚幻的道德架构,否定了禁锢其生命力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吸取、提炼其合理的精神内核,将耶稣所示范的利他主义的伦理逻辑升华成为导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伦理价值范式,并规定为共产党人必须奉行的社会价值准则。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下来的,正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以理论构建、更以生命诠释的、以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范式为起点的

[16] 马克思 Karl Marx,“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Genju yuehanfuyin di 15 zhang di 1 zhi 14 jie xintu he jidu de yizhi,zhezong yizhi de yuanyin he shizhi,ta de juehui biyao jiqi yingxiang [On the Identity of Christians and Christ, Its Reason and Essence, and Its Absolut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John 15: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kesi Engesi Quanji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第40卷 Vol.40,(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2),820.

[17] 马克思 Karl Marx,“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Qingnian zai xuanze zhiye shi de kaolu [Reflections of a Young Man on the Choice of a Professio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kesi Engesi Quanji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第1卷 Vol.1,(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7),459.

[18] 张允熠 Zhang yunyi:“马克思主义形成背景中的欧洲文化传统”Makesi zhuyi xingcheng Beijing zhong de ouzhou wenhua chuantong [The European Cultural Tradition as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马克思主义研究》Makesi Zhuyi Yanjiu [Studies on Marxism] No.6,2012.

[19] 韦正翔 Wei Zhengxiang,“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世伦理’观”Lun Makesi he Engesi de “pushi lunli”guan [Marx and Engels' Views on “Universal Ethics”],《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Shoudou Jingji Maoyi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o.6,2010.

共产主义道德。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20] 因此可以说,利他主义还是自利主义,这是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和主导的科学的全球伦理与迄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伦理的理论逻辑起点和社会实践分水岭。

四

在扬弃西方全球伦理的同时,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道德至上、自强不息、贵和尚中、天下大同、群体本位、见利思义、戒杀好生、勤俭节约等宝贵的精神、原则和意识,^[21]与一直广为认可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道,也将成为科学的全球伦理体系之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伦理思想的提炼和升华那样,科学的全球伦理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思想也是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运用的。改造和创新的关键,是重新赋予传统伦理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内涵,将其提升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助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够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时代精神。此外,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全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2]科学的全球伦理从内容上讲当然也要涵盖这里陈述的“24字”核心价值观,但二者的主旨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分别在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层面上提出的伦理要求和价值导向,高度浓缩的表述体现了将先进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用意,目的是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全面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科学的全球伦理体系则既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全球,目的是扬弃和超越西方的全球伦理思潮,并在全世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因此应当特别强调实践主体的先进性和示范效应。由于本文立意之重点在于应对和超越西方的全球伦理构想,亦限于篇幅,拟对这两方面点到为止,不展开论述。总之,科学的全球伦理作为西方全球伦理构想的对立面,其价值观的内核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其逻辑理论的起点是乐观的人性论,其伦理范式是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其实现路径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它要在与既有的全球伦理积极互动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它的倡导者和实践主体将是一切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觉悟的“地球村”村民;它虽然在内容上与中国创建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所重叠,但并不与之相同。

正是基于科学的全球伦理与西方的全球伦理、中国传统的伦理智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 《中国共产党章程》Zhongguo Gongchandang Zhangcheng [Constitution of CPC], (单行本,中共十八大部分修改) (danxingben, zhonggong shibada bufen xiugai) [separate edition, revised and adopted at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ov., 2012)

[21] 靳凤林、杨义芹 Jin Fenglin, Yang Yiqin, “民族精神与普世伦理的辩证统一” Minzu jingshen yu pushi lunli de bianzheng tongyi [The Dialectic Unity Between National Spirits and Universal Ethics],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Makesi Zhuyi yu Xianshi (shuangyuekan) [Marxism & Reality (bimonthly)] No. 4, 2010; 陈德峰 Chen Defeng, “论儒学对“全球伦理”建构的价值“Lun ru xue dui “Quanqiu Lunli” goujian de jiazhi [Confucianism on Construction Value of Global Ethics],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Humanity Sciences)] No. 6, 2002.

[22] 胡锦涛 Jintao Hu,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jiandingbuyi yanzhe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daolu qianjin, wei quanmian jiancheng xiaokang shehui er fendou [Firmly March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中共十八大报告 zhonggong shibada baogao [Report to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v. 8, 2012.

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完善和推广科学的全球伦理才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在构建的过程中,将逐步清楚地回答我国学界 20 年来围绕全球伦理思潮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有助于学界找到理论创新的方向和抓手,并整合全国理论界的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在国际思想观念碰撞和学术交流活动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更好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建设服务,造福于中国人民。其次,笔者认为,这将是让共产主义理想相对具象化的一种尝试,在急需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的形势面前,科学的全球伦理有助于创新对党员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促使党员干部队伍和政府公务人员把信仰承诺和服务工作落到实处,推进党的建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第三,科学的全球伦理在国际上彰显自身科学性的同时,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传递自己的声音、提升形象、提高声望。最后,如同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良那样,科学的全球伦理作为西方全球伦理的对立面而出现,也必然会促使西方理论界反思和完善自己的伦理构想,从而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应当承认,如同科学社会主义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那样,科学的全球伦理并不具有唾手可得的现实性,而是一个开放的、长期的构建、完善和推广过程。我们怎样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之于空想社会主义,也可以同样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全球伦理的科学性:谓之以“科学”,是因为与现行的全球伦理构想相比,它将选择由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相结合的路径,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过程之中逐步实现自身。在应然的意义上讲,科学的全球伦理是由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前途和福祉为目标而建构的,因而既可以视之为中华民族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创见,也可以借用黑格尔的历史观,把它看作“普遍的世界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自我扬弃、自我丰富、自我发展、自我解放的结果。^[23]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精神”没有物质就无以成其为自身,因此从实然的意义上讲,建构和完善科学的全球伦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共产党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党性的自我纯洁为前提和保障,失去这样的前提和保障,如同眼睛失去瞳仁,它还会沦为人类道德的乌托邦又一版本的臆语。

结 语

过去,中华文明曾数度成为世界文明的典范;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确立自己的世界话语权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飞速推进、人类却深感吉凶难料的背景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勇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反对无所作为和一切有悖于改革开放的主张,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有机会在一个相对短得多的时间内构建一种熔东西方文明之精华于一炉的全球伦理,实现自身理想并造福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2012—世界末日”之谬说早已尘埃落定,人类步入了新的历史纪元;从多种意义上讲,尽管仍旧面临许多艰巨的挑战,当今的中国已经再次开启了民族复兴的大门。怀着复杂的情愫,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拭目,要看中国共产党往哪里走、怎样走。除了期待,让我们送上祝福吧!

[23] (德)黑格尔(GER)G. W. 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Lishi Zhexue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王造时 Wang Zhaoshi 译,(上海 Shanghai:世纪出版集团 Shiji chuban jituan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2001),72.

English Titl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Universal Values: From Moral Utopia to a Scientific System of Universal Values

XU Shiqiang, male, born in 1975, Ph. D. candida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t Institute of Daoist and Religious Cultural Studies i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P. R. China. Tel. + 86-151-0289-9235, email: wsxusq@aliyun.cn, Zip code: 610015.

CHEN Jianming, male, born in 1953, Ph. D. in History, Professor and supervisor for Ph. D. students at Institute of Daoist and Religious Cultural Studies in Sichuan University. Tel. + 86-130-8440-6116, Email: chenjmwl@qq.com, Zip code: 610015,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P. R. China.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promo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is dominated at present by Western scholars. The responses of Chinese scholars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conspiracy theory’ and b) three trends of a ‘utopia theory’. Conspiracy theorists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any universal values and, in fact, perceive them to be promoted with covert intentions that deserve serious criticism and resistance. Utopian theorists believe in universally applicable values but, when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 system, usually end up stuck in either aesthetic pessimism, credulous optimism, or pragmatic idealism. After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emises on which Western moral utopia is built, this thesis instead proposes a scientific system of universal value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es, and which would to sublate and surpass the current Western model. It also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ulfillment of such a system.

Key words: Universal Values, Moral Utopi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ientific Universal Values,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